

良渚遗址群葡萄畈遗址出土的刻纹陶片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

## 第八辑

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共收录了国内外四十余位与会学者的学术研究论文。内容主要为中国东南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包括该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文化面貌、文化性质的研究，并着重于对该地区尤其是太湖流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进行深入、广泛的探讨和研究。

本书可供考古、文物及历史研究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ISBN 7-03-018138-7

Ⅰ. 浙… Ⅱ. 浙… Ⅲ. 良渚文化—文化遗址—学术会议—文集

Ⅳ. K871.1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574 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 海 宁 / 责任校对：李奕萱

责任印制：安春生 / 封面设计：陈 敬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10 月第 一 版 开本：889×1194 1/16

200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40 插页：20

印数：1—1 600 字数：985 000

**定价：2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佳信达〉）

# 十年磨一剑

## ——世纪之交的浙江史前考古（代序）

曹锦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 70 周年，与上一次 60 周年纪念时的情况相比，中国东南地区史前考古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已不可同日而语。

这 10 年，恰逢世纪之交，我所同仁本着无私奉献、独立思考的精神，在史前考古的调查、发掘和研究上，孜孜不倦，成果斐然。借此“纪念良渚遗址发现 70 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对本所过去 10 年的史前考古工作作以简要的回顾[①]。

##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取得突破

浙江的旧石器调查研究肇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1974 年在建德县乌龟洞发现了一枚人的右上犬齿化石，另有属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 11 种哺乳动物化石。这枚右上犬齿化石属于晚期智人，绝对年代距今不超过 50000 年，但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与之相关的石制品标本[②]。

从 2002 年开始，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了多次旧石器考古调查，调查主要集中在钱塘江以北的苕溪流域，还涉及了钱塘江流域，至 2005 年年底，共发现旧石器地点 58 处，其中 24 处在网纹红土等中更新世地层中发现石制品，共获得石制品近 2000 件。这些调查的成果填补了浙江无旧石器文化遗址的空白[③]。

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两次考古发掘成果累累。安吉县溪龙乡的上马坎遗址，2002

---

① 本文引注的发掘资料主要自 1996 年下半年至 2006 年上半年，有关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等也可参考本论文集中由我所业务人员撰写的相关论文。

② 张森水：《遗憾与快慰——忆建德人牙发现始末》，《文物之邦显辉煌——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纪实》第 68～72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张森水、魏丰等：《建德发现的一枚人的犬齿化石及浙江第四纪哺乳动物新资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 年第 16 卷第 3 期。

③ 张森水、高星、徐新民：《浙江旧石器调查报告》，《人类学学报》2003 年第 22 卷第 2 期。

年调查时曾作过试掘[①]，2004 年 10 月～2005 年 9 月进行正式发掘，发掘面积 100 平方米，发掘深度已达 9 米，石制品 430 余件[②]。该遗址目前已发掘到网纹红土层下的砾石层，此砾石层属早更新世晚期（年代已超出距今 80 万年），出土种类丰富的石制品。2005 年 9 月～2006 年 5 月，对长兴县泗安镇的七里亭遗址（CP029）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 600 平方米，发掘深度达 12.5 米，共发现 760 余件石制品[③]。两个遗址的石制品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石球、石锥、手镐、短镐、雕刻器、尖状器等，文化层堆积相也大体相同，但反映出的石器制造技术却有所差异。

从调查和发掘所获石制品观察，西苕溪流域石制品具有如下特征：大多数石制品粗大而厚重；石制品原料的岩种多样，主要是砂岩和石英砂岩，属就近取材类；打片基本上用锤击法；石器的种类较丰富，但以块状毛坯占优，有少量片状毛坯；石器的加工都用锤击法，加工方式多样等。西苕溪流域石制品与安徽、江苏等周边省份发现的特征基本相似，属于南方主工业，但有适合小流域的地方工业特色，如短身手镐未曾发现于其他地区。石制品的年代从早更新世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晚更新世。

上述材料显示了古人类在西苕溪流域的活动时间相当频繁，而且持续时间很长，人类在浙江地区的活动史可以追溯到距今 80 万年以前。浙江发现的旧石器地点与邻接的皖、苏、赣、闽连成一片，扩大了南方主工业的分布区，向东扩展了一个经度，对南方主工业的发展和区系类型的研究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研究现代人起源与文化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随着工作的深入和材料的增多，皖、苏、浙三省邻接的地区可能会因存在相近的石制品组合而被划归南方主工业的同一亚工业区。已有的旧石器考古材料昭示浙江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前景令人鼓舞：优越的自然条件，使我们有信心在其他流域找到旧石器地点和遗址；石灰岩分布广泛，溶洞发育多，为旧石器洞穴遗址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地质条件，这是我们今后旧石器工作的努力方向。另外近年来在宁波至舟山航道的海域内打捞出了大量的动物化石标本，经观察，部分标本遗留着非自然力形成的痕迹，这个线索昭示在浙江的海岛上也有望能找到旧石器时代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标本。这些工作必将为人类起源研究和砾石工业区域性特征的探索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 二、浙江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探索

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探索和农业起源，是浙江史前考古工作的一个重心，其成果

---

① 张森水、徐新民、邱宏亮等：《浙江安吉上马坎遗址石制品研究》，《人类学学报》2004 年第 23 卷第 4 期。

② 徐新民：《安吉上马坎遗址发掘告一段落》，《浙江文物》2005 年第 6 期。

③ 徐新民、梁奕建等：《浙江长兴七里亭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2006 年 7 月 26 日。

主要体现在浦阳江流域和曹娥江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

1990 年萧山跨湖桥遗址第一次发掘及简报公布后，2001 年、2002 年对跨湖桥进行的第二、三次发掘及附近新发现的下孙遗址的发掘①，丰富了以跨湖桥遗址为代表的遗址的文化内涵，尽管研究者对“跨湖桥文化”的文化内涵、年代性质等问题到目前仍有争论②，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浙江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情况绝非以前所认识的那么简单，而是有多个源流谱系③。

2001 年在浦江　塘山背遗址发掘期间，发现了上山遗址，2001 年和2004 年对此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以大敞口盆、石磨盘等为代表的遗物特征、大量的打制石器、$^{14}C$ 测年和夹炭陶中“可能的人工早期栽培稻”为东南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④。2005 年 9 月～2006 年 6 月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掘证实并丰富了作为遗址主体的早期遗存的文化面貌，而上山晚期遗存则为探索浦阳江流域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及其文化传承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⑤。

1999～2001 年，结合诸暨楼家桥⑥、浦江　塘山背⑦、萧山茅草山⑧等遗址的发掘和相关考古学调查，“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与研究”课题被国家文物局列为 2001 年度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

2005 年 3～8 月，结合曹娥江流域史前文化遗址专题考古调查，对嵊州小黄山遗址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发掘，发现了上山类型阶段遗存和跨湖桥文化阶段遗存地层上的叠压关系⑨，在当年 12 月召开的“嵊州小黄山遗址学术研讨会”上，大家普遍认为小黄山遗址出土遗物丰富、自身特征十分鲜明，对完整了解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

---

① 蒋乐平：《萧山区下孙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4》第 177～179 页，文物出版社，2005 年。

② 赵辉：《跨湖桥遗址学术研讨会讨论纪要》，《中国文物报》2002 年 4 月 10 日。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一《跨湖桥》之“后记”，文物出版社，2004 年。

④ 蒋乐平、郑建明、芮顺淦、郑云飞：《浙江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3 年 11 月 21 日。

⑤ 蒋乐平、盛丹平：《浙江浦江上山遗址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中国文物报》2006 年 2 月 8 日。

⑥ 蒋乐平、郑建明：《诸暨市楼家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0》第 158、159 页，文物出版社，2002 年。

⑦ 芮顺淦、蒋乐平、郑建明、孟国平：《良渚文化考古又有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01 年 8 月 5 日。蒋乐平：《浦江县　塘山背新石器时代晚期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2》第 206、207 页，文物出版社，2003 年。

⑧ 郑建明：《杭州市茅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2》第 208、209 页，文物出版社，2003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杭州萧山区茅草山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2 年第 9 期。

⑨ 张恒、王海明、杨卫：《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5 年 9 月 30 日。《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掘》，《2005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 9～13 页，文物出版社，2006 年。

认识其区系类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为了尽可能完整把握遗址聚落的情况，2006 年对遗址进行了再次扩大发掘，在遗址整体堆积性状、建筑遗迹等方面取得了突破。以浦江上山遗址和嵊州小黄山遗址为代表的又一支新型考古学文化，已经被学术界所认同。

跨湖桥遗址、上山遗址、小黄山遗址的先后发掘将浙江省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探索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遗址中水稻遗存的发现，对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学术意义。

## 三、河姆渡文化的进一步探索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河姆渡遗址发掘及河姆渡文化确立以来，河姆渡文化的探索一直是浙江史前考古的重要课题[②]。

1996 年 9～12 月，对余姚鲻山遗址进行发掘，鲻山遗址距河姆渡遗址不足 10 公里，遗址的堆积状况、内涵特征及时代大体与河姆渡遗址相对应，遗址材料极大地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③]。

1997 年 3～6 月，对北仑沙溪遗址进行了第二期扩大发掘。发掘者从文化因素上将遗址的内涵分为三种成分，对进一步探索认识宁绍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材料[④]。

2004 年 2～7 月，西南直线距河姆渡遗址 7 公里的田螺山遗址正式发掘。田螺山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条件最好、地下遗址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处依山傍水式的古聚落遗址，是继鲻山遗址之后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又一重要发现[⑤]。目前遗址已进行了科学的保护和展示，第二次发掘即将进行。我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共同承担的“浙江余姚田螺山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自然遗存综合研究”也已纳入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2006 年计划。期盼着多学科合作的发掘能为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经济形态、聚落形态等提供更为丰富、深入的资料[⑥]。

---

① 参见《专家谈：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 年 1 月 11 日。

② 河姆渡文化课题组：《二十年来河姆渡文化的认识与探索》，《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1979～1999）》第 1～22 页，西泠印社，1999 年。

③ 王海明：《余姚河姆渡鲻山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7》第 144 页，文物出版社，1999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浙江余姚市鲻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 年第 10 期。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北仑区博物馆：《北仑沙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5 年第 1 期。

⑤ 孙国平、黄渭金：《余姚田螺山遗址初现端倪》，《中国文物报》2004 年 8 月 6 日。《浙江余姚田螺山河姆渡文化遗址》，《2004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 5～8 页，文物出版社，2005 年。

⑥ 除此之外，2004 年 5～8 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对位于慈城镇八字村的傅家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的丰富遗物和遗迹也为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新的考古材料。

# 四、马家浜文化的考古发现

继20世纪50年代湖州邱城、嘉兴马家浜、海宁彭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以及70年代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以来，马家浜文化的考古工作相对比较薄弱，在过去的10年中，浙北地区的马家浜文化遗存遗址地点发现虽多，但遗址堆积多呈现不同文化阶段多层次叠压堆积的情况，而且马家浜文化早期遗址还有待进一步的发现，这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探索浙北地区马家浜文化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聚落形态和区系类型带来了一定的难度①。

2001年11月～2002年1月发掘的嘉兴吴家浜是唯一一处堆积单纯的马家浜文化时期遗址，发掘清理的房屋建筑遗迹、灰坑、墓葬及遗物为马家浜文化晚期阶段文化面貌的研究提供了部分丰富的资料②。

2005年11月，为配合马家浜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和马家浜遗址公园的建设，对马家浜遗址进行系统考古调查和钻探，确定了马家浜遗址确切的分布范围及地下堆积的大致情况③。

浙北地区包含马家浜文化时期堆积的重要遗址，还有良渚庙前、余杭獐山南庄桥④、湖州云巢乡上山⑤、湖州千金塔地、安吉安乐和芝里、长兴江家山等⑥，尤其是分布于太湖西南苕溪流域的马家浜文化遗址，颇值得注意。随着近几年江苏宜兴骆驼墩、江阴祈头山等遗址的发掘，如何利用已有的线索进一步开展工作将是我们今后在这一地区的重要任务。

有关钱塘江南岸地区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时期遗存的文化性质和文化内涵大家仍有不同的意见，除了诸暨楼家桥等遗址的发掘外，主要还有2004年11月～2005年1月绍兴杨汛桥寺前山遗址的发掘，该遗址还发现了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石坎护坡遗迹⑦。

---

① 有关嘉兴地区等马家浜文化的发掘情况、资料介绍等参见嘉兴市文化局：《马家浜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

② 南辕：《嘉兴吴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第204、205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兴市博物馆：《嘉兴吴家浜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④ 刘斌：《余杭市南庄桥新石器时代至明清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第170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⑤ 田正标：《湖州市上山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第172、173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⑥ 参见下文相关遗址的介绍。

⑦ 王海明：《绍兴杨汛桥发现马家浜文化遗址》，《浙江文物》2005年第1期。

# 五、崧泽、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和重要收获

## （一）嘉兴地区的考古发掘和重要收获

嘉兴地区最近几年基本建设多，尤其是土地整理使得原始地貌发生巨大变化，大批的遗址遭受或面临前所未有的破坏，所以浙北地区的野外工作也主要集中在嘉兴地区[①]。

普安桥遗址的发掘将会是今后良渚文化考古的一座里程碑。1995～1998 年我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日本上智大学联合发掘的桐乡普安桥遗址是“中日合作研究浙东史前考古”课题的中心项目，发掘在田野考古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通过前后三次的发掘及多次的室内整理研究，明确了土台的营建过程和营建模式，尤其是对营建—使用—扩建—废弃的过程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单元遗迹方面如“面”的确认和解释[②]、墓葬封土和棺椁结构的揭示、土台与房子的关系、土台的拓展及其和墓葬的关系、土台之间的关系等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③]。

除了普安桥遗址的发掘，其他考古工作均是基建过程中的抢救性发掘，取得的一系列收获主要体现在遗址堆积过程的判读、区系类型的深化和聚落形态的进一步探索上。此外，还有一大批重要遗物的出土和遗物重要组装形式的发现。其中发掘规模较大、收获较丰的重要发掘有：

1996 年 4～11 月嘉兴南河浜遗址的发掘。遗址上承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贯穿崧泽文化的始终，其中崧泽文化堆积、遗迹和遗物均呈现出发展的延续性和不间断性，是过去 10 年崧泽文化考古的最重要收获之一[④]。

2002 年 9 月～2004 年 1 月海盐仙坛庙遗址的连续发掘。发现了分属于崧泽文化早期和晚期的人工营建土台遗迹，以及自崧泽、良渚过渡期到良渚文化晚期多次扩建、持续使用的高土台专用墓地一处，清理了各阶段墓葬 134 座，其中 M52 出土的刻划“干栏式”

---

① 有关嘉兴地区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考古资料另可参见嘉兴市文化局：《崧泽· 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 年。

② 赵辉：《遗址中的“地面”及其清理》，《文物季刊》1998 年第 2 期。

③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上智大学联合考古队：《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 4 期。方向明：《桐乡普安桥良渚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6》第 143 页，文物出版社，1998 年。方向明：《桐乡市普安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9》第 171 页，文物出版社，2001 年。

④ 刘斌、蒋卫东：《嘉兴南河浜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7》第 145、146 页，文物出版社，1999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嘉兴南河浜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 年第 6 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 年。

建筑符号的器盖尤为珍贵[①]。

2001 年 3 月 ~2002 年 1 月桐乡新地里遗址的发掘。在 2500 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较为完整地揭示了一处良渚文化高土台的营建和使用过程，清理了良渚文化墓葬 140 座及灰坑、灰沟、井、祭祀坑、红烧土建筑遗迹等多种遗迹，G1 和 H11 中的出土遗物还为认识嘉兴地区良渚文化晚期阶段的面貌提供了新材料[②]。

2003 年 6 月 ~2004 年 10 月平湖庄桥坟遗址的发掘。发掘面积 2000 平方米，清理良渚文化中晚期墓葬（236 座）以及灰坑、沟、祭祀坑等遗迹，其中 H70 坑内发现 1 件带木质犁底的组合式分体石犁，是继新地里遗址墓葬中野外出土分体石犁后的保存有木质犁底的唯一一例，为完整复原石犁的组装方式以及石犁的确切功能提供了直接的证据[③]。庄桥坟遗址目前仍在继续发掘中，随着发掘面积的扩大，遗址的整体面貌将会进一步得到了解。

此外，下列考古发掘项目也获取了重要考古资料和研究信息。

1996 年 4 ~7 月桐乡叭喇浜遗址的发掘。其中良渚晚期 H2 出土镂刻台形符号的豆是第一次的科学发掘品[④]。

1996 年 12 月海盐窑墩遗址的发掘。清理了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的灰坑 4 座[⑤]。

1997 年 5 ~7 月海盐龙潭港遗址的发掘。清理了红烧土遗迹 1 处、良渚文化墓葬 20 座。发掘者从墓地布局、随葬品种类和组合、同期大小墓内同类随葬品的差异探讨了社会组织关系[⑥]。

---

① 王宁远、李林：《海盐县仙坛庙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4》第 179、180 页，文物出版社，2005 年。王宁远、蒋卫东、李林、沈明生：《浙江海盐仙坛庙发现崧泽文化早期到良渚文化晚期文化遗存》，《中国文物报》2004 年 2 月 4 日。《浙江海盐仙坛庙遗址》，《2003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 27 ~ 32 页，文物出版社，2004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海盐仙坛庙遗址的发掘》，《崧泽· 良渚文化在嘉兴》第 218 ~228 页，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 年。

② 蒋卫东、丁品、周伟民、朱宏中：《桐乡市新地里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2》第 207、208 页，文物出版社，2003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桐乡新地里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 年第 11 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 年。

③ 《浙江平湖庄桥坟良渚文化墓地》，《2004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 30 ~34 页，文物出版社，2005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湖市博物馆：《浙江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考古》2005 年第 7 期图版叁、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湖市博物馆：《平湖庄桥坟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崧泽· 良渚文化在嘉兴》第 233 ~244 页，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 年。

④ 王海明：《桐乡叭喇浜良渚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7》第 147、148 页，文物出版社，1999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叭喇浜遗址发掘》，《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 年。

⑤ 孙国平：《海盐窑墩遗址》，《崧泽· 良渚文化在嘉兴》第 162 ~164 页，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 年。

⑥ 孙国平、李林：《海盐县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8》第 127、128 页，文物出版社，2000 年。孙国平、李林、沈明生：《海盐发现新型良渚文化墓地》，《中国文物报》1998 年 6 月 14 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浙江海盐县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考古》2001 年第 10 期。

1999 年5 ~7 月嘉兴凤桥高墩遗址的发掘。清理了良渚文化墓葬12 座，其中M3 头骨上部出有一套由 6 枚野猪獠牙组合而成的束发头饰①。

1999 年7 ~9 月海盐周家浜遗址的发掘。发现了良渚文化人工营建小型土台 2 座、石筑遗迹1 组、灰坑8 座及墓葬 35 座，其中 M30 冠状器镶插在象牙质的梳子上，保存完好，发掘者由此将其定名为“玉梳背”②。

2000 年 5 ~7 月嘉兴凤桥镇石圹头遗址的发掘。清理崧泽文化墓葬和水井各 1 座，良渚文化墓葬 7 座③。

2001 年12 月 ~2002 年 1 月，嘉兴大桥镇高墩坟遗址的发掘。清理了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 4 座、祭祀坑2 座，崧泽文化时期水井 3 座、灰坑 3 座，良渚文化时期水井 2 座④。

2002 年 12 月 ~2003 年5 月海宁杨家角遗址的发掘。主要的收获是叠压墓葬土台的“草木灰”堆积中大量崧泽文化晚期实用陶器的发现⑤。

2003 年 10 ~ 12 月桐乡董家桥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叠压在春秋战国堆积层下的良渚文化晚期堆积⑥。

2004 年 11 月 ~2005 年 1 月桐乡姚家山遗址的发掘。其中以 M2 出土的雕琢有神人兽面像的象牙器和玉刀（“耘田器”），M3 出土的刻铭石钺及其他墓中出土的 4 件玉镰（戈形器）尤为重要。野外还发现了21 座与高台墓地或墓葬有关的“祭祀坑”⑦。

2004 年12 月 ~2005 年1 月海宁东八角漾遗址的发掘。发掘良渚文化时期小高台墓地

---

① 刘斌、蒋卫东：《嘉兴市高墩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0》第 160 页，文物出版社，2002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兴市博物馆：《嘉兴凤桥高墩遗址的发掘》，《崧泽· 良渚文化在嘉兴》第 177 ~ 182 页，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 年。

② 蒋卫东、刘斌：《海盐县周家浜良渚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0》第 161、162 页，文物出版社，2002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海盐周家浜遗址发掘概况》，《崧泽· 良渚文化在嘉兴》第 183 ~ 191 页，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 年。

③ 刘斌：《嘉兴市石圹头新石器时代及西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1》第 169、170 页，文物出版社，2002 年。

④ 王宁远：《嘉兴市高墩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2》第 205、206 页，文物出版社，2003 年。

⑤ 楼航：《海宁市杨家角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4》第 181 页，文物出版社，2005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杨家角遗址发掘情况简介》，《崧泽· 良渚文化在嘉兴》第 229 ~ 232 页，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 年。

⑥ 田正标：《桐乡市董家桥良渚文化及春秋战国时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4》第 182、183 页，文物出版社，2005 年。

⑦ 王宁远、周伟民、朱宏中：《浙江桐乡姚家山发现良渚文化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国文物报》2005 年 3 月 25 日。《桐乡姚家山发现良渚文化高等贵族墓葬》，《崧泽· 良渚文化在嘉兴》第252 ~ 254 页，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 年。《浙江桐乡姚家山良渚文化贵族墓葬》，《2005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 23 ~ 28 页，文物出版社，2006 年。

一处，清理墓葬10座[①]。

2004年12月~2005年3月平湖当湖街道图泽遗址的发掘，清理发掘良渚文化墓葬39座，其中随葬实用性陶鼎及实用性与非实用性陶鼎共存的现象，是发掘中的一个重要认识和发现[②]。

## （二）湖州地区的考古发掘和重要收获

湖州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北依太湖，西北与江苏西南部和安徽东南部接壤，东部面向广袤的嘉兴平原，南部则是著名的良渚遗址群。湖州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起步比较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50年代，浙江地区的几次重要考古发掘均在湖州，如钱山漾和邱城遗址的发掘，但之后除了1992年邱城遗址第四次发掘后一直少有工作，2004年前后湖州地区尤其是相当于崧泽文化时期的考古揭开了新的一页。

2004年3月~2005年1月昆山遗址的发掘。清理了相当于崧泽文化晚期阶段的墓葬61座，随葬品的陶器组合和形态、石器中的石犁和石刀等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不仅丰富了昆山遗址的内涵，而且为探究太湖西南地域该阶段的文化面貌和变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③]。

2004年3月~2005年1月塔地遗址的发掘。主要清理了马家浜—良渚等时期的墓葬58座、马家浜—马桥各时期的灰坑130座等，塔地遗址是目前太湖西南地区所发现的史前文化序列保存较完整的少数遗址之一，同时发现的与花厅、好川等遗址出土的形制相近的多种器物，还对探讨良渚文化的下限年代及其与大汶口文化、好川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④]。

2005年4~7月安吉芝里发掘，发现了马家浜、崧泽时期墓葬、居址和“环壕”复合的聚落形式，共清理墓葬123座，出土遗物400余件[⑤]。芝里遗址与安乐遗址[⑥]相距不远，

---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海宁东八角漾遗址发掘报告》，《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第245~251页，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年。另外，海宁市在土地整理过程中的抢救性发掘还有2002年1月得到我所徐新民、刘斌等指导并由海宁市博物馆负素清理的金石墩遗址的发掘，共清理良渚文化墓葬13座，其中随葬陶器上的多件（组）刻划符号的发现尤为重要。发掘资料见海宁市博物馆：《浙江海宁金石墩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3年第5期。

② 芮国耀、杨根文：《平湖图泽良渚文化墓地》，《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第255~257页，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年。陆敏仙、田敏：《平湖图泽遗址考古发掘有重要收获》，《浙江文物》2006年第2期。

③ 方向明、闵泉、陈兴吾：《浙江湖州市昆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28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省湖州市昆山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昆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④ 塔地考古队：《浙江湖州塔地遗址发掘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9日。《浙江湖州塔地新石器时代遗址》，《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35~39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⑤ 程永军：《芝里遗址考古发掘成果丰硕》，《浙江文物》2005年第5期。

⑥ 参见《安吉县安乐窑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第145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南辕：《安吉县安乐崧泽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第206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目前进一步的发掘仍在进行之中。

2005 年4 月～2006 年7 月对长兴江家山遗址进行了连续两次的发掘。共清理马家浜、崧泽、良渚时期墓葬340 座，马家浜时期沟2 条等遗迹[①]。属于西苕溪流域的江家山遗址地理位置独特，所处的流域谷地其西北分别与皖南和江苏宜溧山地以北相接壤，而东南通过苕溪流域的重要遗址点就有邱城、毘山等乃至良渚遗址群，如果今后将太湖西南地区苕溪流域的遗址点进行综合性的整体考虑，相信对于良渚文化中心的良渚遗址群研究会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2005 年3～6 月湖州钱山漾遗址的发掘。发掘面积1400 平方米，揭露一处经先民们反复营建居住形成的土台型遗址，土台上部最晚阶段即该遗址的晚期遗存是一处属于马桥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而土台的前三个阶段即该遗址的早期遗存，发掘者认为可能是太湖地区一支崭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并称之为“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发掘者初步认为其相对年代与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相当，在太湖地区文化序列中可能晚于良渚文化或与良渚文化末期略有重叠，而早于马桥文化[②]。2006 年 6 月，在上海松江举行的“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上，钱山漾遗址的发掘收获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和深入讨论。

## （三）良渚遗址群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如果将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至90 年代反山、瑶山、莫角山等地的发掘视为良渚遗址群和良渚文化考古学的重要突破外，那么在过去的10 年中，对于这些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进行整理是良渚遗址群工作的重点项目，目前已陆续整理出版了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至之四，分别为《瑶山》、《反山》[③]、《良渚遗址群》和《庙前》，最近正在

---

① 楼航、梁奕建、华山、童善平：《浙江长兴江家山遗址抢救性发掘获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6 年 4 月 21 日。

② 丁品、郑云飞、程厚敏、潘林荣、郭勇：《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中国文物报》2005 年 8 月 5 日。

③ 日本上智大学教授、中日合作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日方队长量博满先生因故未能莅临本次学术研讨会，量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对《瑶山》、《反山》发掘报告的出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提到：“……两部报告给我目前从事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资料。众所周知，1993 年俞伟超先生和张忠培先生之间围绕考古学的方法有过争论。这次争论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刺激，我曾经有意探寻包括严文明先生在内的三人争论的背景和真实意图。也就是以此次争论为契机，一直在考古学方法和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思索的我，开始进行考古学方法论的实践研究。我对精神文化、抽象文化、世界观等领域的研究不是凭主观和肆意的解释，而是以物为证据进行研究——即对考古学研究能够带来什么等问题进行探讨。……中国思想的核心是帝和天，太阳崇拜是这种思想发展的一环，我以此为线索开始研究，虽然一直没有大成果，但研究一直没有停止。我的这些研究是离不开良渚文化相关问题的，从这个方面来说，《瑶山》和《反山》两部报告对我来说是有意义和重要的两部报告……。”

整理和计划整理的遗址群发掘报告有：汇观山、文家山、卞家山、塘山（金村段）的报告等。良渚遗址群的田野调查和发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主要为结合报告的出版对相关重要遗址进行再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1996～1998 年，鉴于瑶山遗址发生多次盗掘，因而对其又进行了多次清理和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基本了解了瑶山遗址中心区域的营建结构和过程，以及整个遗迹的平面布局和范围，丰富了《瑶山》报告的内容[①]。

2001 年，为结合反山报告的整理工作，对反山遗址进行了有目的的考古调查，初步确认了 M19、M21 应为晚于以 M12 为代表的墓葬的阶段，证实了室内整理过程中的判断[②]。

继 1981 年吴家埠遗址发掘以后，我所组织考古人员曾先后对良渚遗址群进行过多次专题调查，在此基础上，1996 年以后的遗址群考古调查我们采取分片块、普查与重点区域调查相结合的方式，确认和新发现遗址目前为 135 处，初步掌握了遗址的分布特点和聚落关系。2005 年《良渚遗址群》考古调查报告正式出版[③]。

**2. 主动性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1996 年 12 月～1997 年 1 月，为整体了解“塘山”的性质年代，分别在金村及猫耳弄等地段进行调查和试掘，其中金村段发现与制玉有关的遗物和遗迹，1997 年为进一步了解这一地段堆积的性状，进行了小范围的揭露和试掘，2002 年 4～7 月，在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发掘面积进行了扩大，获取了大量残玉器件和与制玉有关的石器，并初步明确了塘山金村段应为良渚晚期玉器作坊遗址，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再加上前后几次考古工作未能一气呵成，考虑到今后的工作和保护的需要，探方均未及底，发掘后做了保护性的回填[④]。至于总体上暂时命名的约 5 公里长的“塘山”其他地段的调查和试掘，1998 年曾利用各通道缺口和取土造成的断面进行了观察和钻探，2001 年下半年还对位于塘山西部的局部地段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由于各地段堆积的复杂性，目前还无法对遗址整体做出准确的判读。今后“塘山”的进一步工作不仅需要对遗址本身进行分段解剖，还需要跳出“塘山”本身，对周边区域进行整体的考古调查。

姚家墩遗址是良渚遗址群北部的重要遗址，1988 年曾有两条探沟试掘，1998 年在钻探

---

① 丁品：《余杭市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第 172 页，文物出版社，2001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余杭瑶山 1996～1998 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2001 年第 12 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 年。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 年。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良渚遗址群调查简报》，《文物》2002 年第 10 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 年。

④ 方向明：《杭州市良渚塘山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第 180、181 页，文物出版社，2004 年。王明达、方向明、徐新民、方忠华：《塘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制玉作坊》，《中国文物报》2002 年 9 月 20 日。

的基础上，选择遗址中部和南部进行3条探沟的试掘，发现了与建筑相关的丰富迹象。2002年3~7月，对姚家墩遗址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在这项重要的主动性考古发掘中，清理了多处良渚文化土台和房屋遗迹，为今后整体上对遗址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①。

2000年结合钵衣山遗址的再次发掘，调查试掘了位于钵衣山遗址南部的官庄遗址，官庄遗址与梅园里遗址相距不远，濒临现在的东苕溪，为进一步了解遗址的性状，2002年冬，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扩大发掘，清理发掘了多处建筑遗迹②。

**3. 积极开展聚落考古学的探索**

庙前遗址是良渚遗址群考古工作时间最长、发掘面积最大、遗物堆积也最为丰富、复杂的重要遗址。1999~2000年，对庙前遗址进行第五、六次的考古发掘，在有限的发掘区域内根据地层堆积情况确认了遗址的堆积过程、各单项遗迹之间历时和共时的相对关系，为进一步探索良渚遗址群内的聚落形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③。尽管我们以分阶段并结合周边相关遗址的发掘进行公布，但是由于发掘工作间隔时间长、各发掘区之间因为基本建设而支离破碎，客观上影响了对遗址整体的全面了解，另外有关房子等建筑迹象之如何清理和判读还有待今后更好的突破。

卞家山遗址位于瓶窑镇东南部，2002年底试掘并确认遗址分布范围。2003~2005年经过三次发掘，总计揭露面积2600平方米，基本明确了遗址的聚落形式和规模，发现了墓地、居址和大型灰沟遗迹。发掘表明遗址北部为良渚早中期至中晚期的大型墓地，共清理墓葬66座，中部为良渚中晚期的两条大型灰沟，南部为良渚晚期的“河埠头”及“码头”，遗址由北往南扩展，延续时间较长。其中发现的大量良渚文化晚期遗物大大丰富了对良渚晚期社会发展水平的认识，卞家山遗址位于原先认识的良渚遗址群南部边缘，这次发现还为良渚遗址群的分布范围提供了重要的资料④。

**4. 良渚遗址群的其他考古新发现**

1999年10月~2000年1月石前圩遗址的发掘。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清理了3座

---

① 芮国耀、楼航：《杭州市良渚姚家墩良渚文化和战国时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第181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③ 方向明：《良渚庙前良渚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0》第159、160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方向明：《余杭市庙前良渚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第168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良渚庙前遗址第五、六次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12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④ 赵晔：《余杭卞家山遗址发现良渚时期“木构码头”等遗存》，《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27日。《浙江余杭卞家山遗址》，《200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33~39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赵晔：《余杭市卞家山良渚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第181、182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良渚墓葬、5 条并行的“灰沟”及房屋和灰坑遗迹，出土了一批良渚晚期的遗物[①]。

2000 年 11 ~ 12 月钵衣山遗址的再次发掘。主要清理了卵石叠砌的 H9、J1 等重要遗迹，其中 J1 深达 5. 86 米，由于其建在海拔约 13 米的坡地上，所以对于性质的判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

2000 年 11 月 ~2001 年 1 月文家山遗址的发掘。清理良渚文化中晚期墓葬 16 座，其中 M11 出土了石钺 34 件。在文家山遗址的地层中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石钻芯，不仅表明附近当有石器加工场的存在，还为管钻工艺提供了很好的标本[③]。

2004 年 9 月 ~2005 年 7 月石马 遗址的发掘。遗址位于良渚遗址群南部的大观山南侧，2004 年经过钻探试掘确认。遗址主要为崧泽时期的台地遗址，共清理崧泽时期墓葬 80 座，灰坑 24 座，获得陶、石、玉器 500 余件。石马 遗址毘邻大观山北面的良渚遗址群，而崧泽时期墓葬在良渚遗址群已知的遗址中尚未发现，填补了这一地区史前遗址年代上的缺环，对于了解良渚遗址群的分布范围以及周边情况具有重要意义[④]。

2004 年下半年良渚横圩里遗址的发掘。发掘面积 1200 平方米，清理墓葬 26 座、房子 2 座及灰沟 2 条，其中清理出的漆绘图案和一批良渚晚期遗物尤为珍贵[⑤]。

上述在良渚遗址群内的考古新发现，除了石马 遗址外，主要的收获是获取了遗址群内一批良渚文化晚期的丰富资料，自安溪百亩山出土铭刻台形符号的玉璧以来，良渚遗址群内良渚文化晚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虽有线索但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也希望在今后能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⑥]。

除了上述良渚遗址群的考古工作之外，与遗址群相邻不远的重要发掘还有位于遗址群以东的余杭后头山和三亩里遗址的发掘，其中后头山 H2 出土的 2 件套组合石犁和 M18、M21 资料尤为重要[⑦]。

### （四）钱塘江以南地区的考古发现

钱塘江以南，主要有浦江 塘山背和诸暨尖山湾的发掘[⑧]。

---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钵衣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2 年第 10 期。

③ 赵晔：《余杭市文家山良渚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1》第 168、169 页，文物出版社，2002 年。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⑤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⑥ 通过反山 M21 出土玉器的整理并结合 2002 年对遗址的再次调查，可大致明确 M21 应当为该时期的显贵者墓葬，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 年。另 2006 年 4 月，安溪后杨村因村民建房出土了良渚文化遗物，良渚遗址管委会对暴露的几座墓葬进行抢救性清理后交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发掘。经过一个多月的揭露，共清理良渚文化晚期墓葬 9 座，出土各类随葬器物 250 余件（组）。

⑦ 丁品、林金木：《杭州余杭新桥后头山遗址发掘一处良渚文化墓地》，《中国文物报》2005 年 3 月 11 日。

⑧ 钱塘江以南地区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暂将该地区收获放在此小节中。

2001 年 2 ~ 5 月，浦江县黄宅镇　塘山背遗址的发掘。清理墓葬 44 座，墓坑东西向，多呈长条形，根据堆积判断应有独木棺葬具，随葬品基本组合为鼎、豆、壶、簋，另外还有釜、罐、盉等。其中清理的四穴合葬墓之 M24 尤为重要。发掘者认为这是钱塘江以南发现的第一个良渚文化墓地[①]。

2005 年 4 ~ 7 月，在基本建设过程中诸暨尖山湾遗址的发掘是浦阳江流域考古所取得的又一重要发现，该遗址 2000 年前后曾做过小范围试掘，遗址主体堆积约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以鱼鳍形鼎足和柱状鼎足共存、多斜背（脊）形和台阶形有段石锛、椭圆体粗重石斧、多种形态的石镞共存、少见绳纹装饰等为主要内涵。这些具有明显特征的文化遗物，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浙江中部地区相当于良渚时期的史前文化空白，对研究钱塘江以南地区史前文化的多元结构、良渚文化传播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②]。

## 六、好川文化的提出

自 1977 ~ 1979 年江山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以来，相当于肩头弄期遗存的探索我们一直希望得到突破，随着 1997 年 4 ~ 6 月遂昌好川遗址的发掘，这一工作揭开了新的一页，清理的 80 座墓葬的墓室结构、随葬器物特点不仅是浙西南地区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而且为我们在宏观上思考环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及与周边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面貌之间的关系拓展了思维空间。好川 M10、M37、M60 出土的嵌玉漆器（“柄形器”）上的台形玉片与 1989 年良渚安溪百亩山出土玉璧上的铭刻符号结构一致，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因而发掘者提出了“好川文化”这一说法[③]。

2002 年 11 月 ~ 2003 年 4 月，温州老鼠山遗址的发掘。清理的 35 座墓葬除了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外，其主体的文化面貌、内涵特征与好川墓地基本相同，其中 M23 还继好川墓地后又一次出土了一件镶嵌台形玉片的“柄形器”，发掘者同时认为瓯江流域是好川文化的主要分布区[④]。

2004 年对遂昌境内的好川文化遗址进行了专题性的考古调查勘探，本次调查勘探采

---

① 芮顺淦、蒋乐平、郑建明、孟国平：《良渚文化考古又有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01 年 8 月 5 日。

② 孙国平：《钱塘江以南地区史前考古新收获——2005 诸暨至永嘉高速公路尖山湾遗址考古发掘纪要》（未刊稿）。

③ 王海明：《遂昌好川墓地良渚文化晚期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8》第 129 页，文物出版社，2000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 年。

④ 王海明、孙国平、蔡钢铁、王同军：《温州老鼠山遗址发现四千年前文化聚落》，《中国文物报》2003 年 5 月 28 日。王海明：《温州市老鼠山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3》第 182 页，文物出版社，2004 年。王海明：《温州市老鼠山先秦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4》第 183、184 页，文物出版社，2005 年。有关好川及老鼠山遗址的具体情况和相关论述还可参见王海明：《好川文化的几个问题》，《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175 ~ 181 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 年。

用小流域地毯式普查结合重点试掘的方法，不仅发现了多处有益的线索，还在好川岭头岗的东北坡发现了发掘者认为的“平民墓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①。

在过去的 10 年中，除了上述已经提到的一些综合性课题如“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与研究”、“浙江余姚田螺山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自然遗存综合研究”等外，“浙江新石器时代石器研究”、“早期栽培稻的系统特性研究”被列为 2004 年度浙江省文化厅文化科研项目。

除此之外，我所还积极开展与高等院校、境外学术机构等的合作课题。这些由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知识层面组成的课题的确立和开展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深入化的作用。其中如“良渚文化石器研究”、“良渚文化木器研究”、“良渚文化玉器工艺研究”、“中国古代刻画符号的收集与整理”等，这些课题已经基本完成或正在整理过程中。

由于基本建设等和文物保护长期存在着矛盾，再加上野外一线的考古人员人数并不算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着浙江地区地下文物考古调查和科学发掘的艰巨任务，但由于得到了上级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各地文博部门的通力协助，在过去的 10 年中我省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大家较为公认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包含着全所职工的辛勤劳动，特别是工作在第一线的野外考古人员，奉献尤多。但是，任重而道远，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如今后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业务人员综合素质的培养，在救火式的考古项目中更自觉地带着明确的课题意识，使发掘和整理水平能与业务人员的专业技能、研究水平共进，使团队精神得到不断地巩固和加强。就学科而言，在方法论的基础上，仍需要田野工作的突破，但什么是突破、如何认识或面临突破仍然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严肃话题。进一步强调多学科的合作，加强与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多方位合作，开阔视野，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相信未来的 10 年我们一定会有更为丰硕的成果，同时也衷心祝愿本次纪念良渚遗址发现 7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2006 年 7 月

① 谢文君、王海明、杨卫：《浙江遂昌好川墓地发现史前平民墓区》，《中国文物报》2005 年 1 月 7 日。

# 目　　录

十年磨一剑——世纪之交的浙江史前考古（代序）…… 曹锦炎（i）

《反山》——释读良渚文化文明的重要著作 …… 张忠培　杨　晶（1）
一部优秀的考古报告——《反山》 …… 严文明（5）
关于良渚遗址的发现…… 毛昭晰（9）
大汶口文化对良渚文化及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影响 …… 张　弛（14）
良渚玉器纹饰的比较研究——从刻纹玉器看良渚社会的关系网络 …… 秦　岭（23）
小农经济与中国文明的形成及特征——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三 …… 曹兵武（53）
关于良渚文化晚期较晚阶段的遗存 …… 杨　晶（62）
再谈良渚遗址的发现是在 1935 年…… 吴汝祚（74）
论跨湖桥文化独木舟的年代 …… 朱乃诚（76）
海岱地区史前祭祀遗存二题 …… 栾丰实（84）
凌家滩玉器与良渚玉器研究 …… 张敬国（92）
初识薛家岗与良渚的文化交流——兼论皖江通道与太湖南道问题…… 朔　知（105）
良渚文化分布区以外的史前玉琮研究…… 黄建秋（123）
稻作与史前社会演变的关系新探…… 裴安平（141）
祁头山文化遗址、南楼崧泽文化遗址的发掘与思考…… 陆建芳　张童心　左　骏（158）
关于良渚聚落与居住址建筑形式及结构的探讨…… 丁金龙（177）
良渚文明崩溃探究——社会动力及与玛雅崩溃之比较研究…… 陈　淳（194）
长江河口海岸考古地理三题…… 刘志岩　孙　林　高蒙河（208）
新石器时代玉琀…… 黄宣佩（217）
良渚文化衰变研究…… 宋　建（227）
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末期遗存…… 周丽娟（238）
万年前后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 …… 吴春明（258）
福建史前考古十年收获（1996～2005 年） …… 陈兆善（275）
良渚文化玉器发现与研究的心路历程…… 蒋卫东（284）
古国、方国阶段神权在社会结构扩大和维系中的作用管见——《反山》报告
　学习体会 …… 李　岩（310）
良渚礼制研究…… 卜　工（316）

东亚玉器线切割研究现状 …… 邓　聪（335）
从台湾南科大坌坑文化遗址的新发现检讨南岛语族的起源地问题 …… 臧振华（337）
反山 M12“权杖”玉镦、玉瑁的启示 …… 邓淑苹（349）
略论良渚文化石器 …… 中村慎一（364）
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 …… 焦天龙（372）
纪念良渚遗址发现 70 周年 …… 牟永抗（380）
良渚遗址群再认识 …… 王明达（393）
九千年前的远古文化——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 …… 王海明（401）
良渚文化陶器内涵及其礼器化现象探讨 …… 芮国耀（413）
良渚文化的祭坛与观象测年 …… 刘　斌（428）
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思考 …… 蒋乐平（439）
良渚遗址群的时空观察 …… 赵　晔（462）
好川· 良渚· 花厅 …… 孙国平（483）
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与“钱山漾类型文化遗存” …… 丁　品（497）
平湖庄桥坟遗址动物祭祀的初步认识 …… 徐新民（506）
反山 M14 相关问题的补充和研究 …… 方向明（518）
海盐仙坛庙遗址中期聚落试析 …… 王宁远（561）
甜瓜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从长江下游出土的甜瓜属（*Cucumis*）种子谈起 ……
…… 郑云飞　陈旭高（578）
长兴江家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 楼　航　梁奕建（586）
环太湖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考古学探索 …… 郑建明（600）
编后记 ……（614）

# 彩 版 目 录

彩版一　祁头山、南楼遗址全景
彩版二　祁头山遗址出土玉器和陶器
彩版三　祁头山 M82 和 M55
彩版四　南楼 H2 和 M23
彩版五　南楼遗址出土玉器和石器
彩版六　南楼遗址出土陶器
彩版七　南楼遗址出土陶器和石器
彩版八　海盐仙坛庙遗址出土陶盘和吴江同里遗址出土四足方壶
彩版九　南关里遗址的地层堆积及出土的稻米、小米谷粒
彩版一〇　南关里、南关里东遗址出土的陶、贝、石器
彩版一一　小黄山遗址出土陶器和石磨盘
彩版一二　小黄山遗址 A 区 F6、M1 发掘状况
彩版一三　上山遗址出土打制石器和石球
彩版一四　上山遗址发现的大口盆、稻米残粒、陶胎中的稻壳和水稻植硅体
彩版一五　钱山漾类型一期文化遗存陶器
彩版一六　钱山漾类型一期文化遗存陶器
彩版一七　钱山漾类型一期文化遗存陶器
彩版一八　钱山漾类型一期文化遗存陶器
彩版一九　钱山漾类型一期文化遗存陶、石、骨器
彩版二〇　钱山漾类型二期文化遗存陶器
彩版二一　钱山漾类型二期文化遗存陶、玉器
彩版二二　钱山漾类型二期文化遗存陶器
彩版二三　钱山漾类型二期文化 M1、H150 及 H137 发掘后状况
彩版二四　反山 M14 头端部位玉器及葬具板灰的清理状况
彩版二五　反山 M14 头端部位出土的部分玉器
彩版二六　反山 M14 玉钺、串饰等的出土状况
彩版二七　反山 M14 葬具的朱痕及嵌玉漆器等的出土状况
彩版二八　仙坛庙遗址 1 号土台
彩版二九　仙坛庙遗址 M136、G5 及 2 号土台的土坯细部

彩版三〇　仙坛庙遗址2号土台边界的石块及M104发掘状况
彩版三一　甜瓜种子及甜瓜属种皮表面的显微结构
彩版三二　江家山遗址G3、G4出土器物
彩版三三　江家山遗址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墓葬
彩版三四　江家山遗址马家浜、崧泽文化墓葬出土器物
彩版三五　江家山遗址崧泽文化M46
彩版三六　江家山遗址马家浜、崧泽、马桥文化出土遗物
彩版三七　江家山遗址崧泽文化M239
彩版三八　江家山遗址崧泽文化墓葬随葬品摆放位置
彩版三九　江家山遗址崧泽文化墓葬出土器物
彩版四〇　江家山遗址崧泽文化F2

# 《反山》
## ——释读良渚文化文明的重要著作

张忠培　杨　晶
（故宫博物院）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前后约 10 年间，中国考古学挣脱了传统教条主义的束缚，出现了转折，进入了新的时代。作为实事求是治学典范的苏秉琦，成了考古学新时代的领航人。他继 1975 年将中国考古学带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之后，1979 年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暨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指出，中国考古学必须正确回答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大问题。1983 年，苏秉琦于东山嘴遗址找到了探索这一“大问题”的切入口。这年，他倡导、主持了“燕山南北• 长城地带考古工作座谈会”，这是继 1982 年在河北张家口地区蔚县考古工地座谈会之后，有关这一课题的第二次座谈会。会议期间考察东山嘴遗址之际，他即指出这是由原始文化转变为文明时期的重要遗存。随后，苏秉琦进而审视了东山嘴发掘前后所揭示出来的陶寺、牛河梁、大地湾和良渚等遗存，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这一释读中国历史的新理论。

中国考古学仍处在苏秉琦所创立的时代。当年，苏秉琦提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理论之时，上述那些遗存的发掘工作才刚刚开始，只发表了一些简报。无论是充实苏秉琦所开创的中国考古学新时代的内涵，还是要超越苏秉琦所开创的新时代，陶寺、牛河梁、大地湾和良渚，以及与它们同样重要的遗存的发掘报告的出版，便成为中国考古学界共同的殷切期望。可喜的是，自 2003 年作为“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一”的《瑶山》出版之后，又出版了良渚遗址群之二至之四的《反山》、《良渚遗址群》和《庙前》等报告（目前正在整理和计划出版的还有汇观山、文家山、卞家山、塘山（金村段）报告等），其中人们翘首企盼已久的《反山》报告，由王明达、方向明编著，是一部内涵丰富且十分重要的考古报告。

1936 年，施昕更在良渚一带的考古调查，以及他所编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使位于杭州湾的良渚小镇成为了世人瞩目的地方。1986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良渚一带的考古发掘，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探讨，为良渚文化遗址群的保护提供了科学的依据。1986～1995 年，良渚遗址群连续多项考古发掘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90 年代初，张柏副局长接受专家的建议，代表国家文物局宣布良渚遗址的管理，按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对待。1996 年，良渚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浙江省制定了《良渚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名录〉规划》，并颁布了《杭州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良渚遗址因此而声名鹊起，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

《反山》报告，分上、下两册。上册以文字为主，配合线图、拓片，分概述、墓葬、结语三章；下册为图版，通过 1248 幅彩色照片，展示了发掘过程以及 M12、M14、M15、M16、M17、M18、M20、M23 和 M19、M21 等 12 座墓葬及其随葬器物。

粗读《反山》，我们认为，该报告有以下优点：

第一，由于发掘时注意划分层位及整理时对遗存早晚关系有正确的认定，因此作者能将貌似一个时期的反山墓地，划出分别以 M12 和 M21 为代表的早晚两片墓地，其中 M12、M14～M18、M20、M22 和 M23 为早期墓地中的墓葬；而现在发掘范围内仅见的 M19 和 M21 是晚期墓地中的墓葬。

第二，在《反山》上册第二章中，以墓葬为单位，逐一介绍了墓葬的形制、出土遗物、纹饰及其结构。除做了较详细的文字说明外，又以文字叙述为序，发表了线图和拓片。在《反山》下册中也以墓葬为单位，详尽地发表了相关的照片。例如，M12∶98 这件玉琮，就刊出了整体、各个侧面以及各部分纹饰的局部彩色图片 82 版，共计照片 150 幅，可谓既详尽又细致。同时，拓片、照片的清晰度较高。这不仅为研究者查找资料提供了便利，又为读者提供了较为详细的信息。

第三，采用线图、拓片、照片等不同的表现手法，突出玉器各个部分的细部特征与纹饰及其结构，使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到玉器制作工艺的具体情况。

第四，注意墓葬中器物的配伍关系。除了《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已经指出的玉钺与玉钺瑁、玉钺镦三者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 4 件一套的半圆形冠饰之外，《反山》报告中又认定了 M12 出土的由玉瑁和玉镦组成的“权杖”、M23 出土的由 3 组 6 件玉饰组成的纺织器具之端饰，并科学地复原了这些器物的原貌。这对今后探索良渚文化以单件玉器所组装、穿缀或镶嵌成的器物之原貌，提供了经验，具有借鉴意义。

第五，反山良渚墓地成功地提取了一批嵌玉漆器，并复原了 M12 的嵌玉漆杯和漆盘，为研究当时琢玉、镶嵌工艺和髹漆工艺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第六，该报告用较多的笔墨介绍了发掘方案和清理操作规程以及将其付诸实践后遇到问题时如何改进的过程，并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及仍存在的失误与教训，其坦诚的态度跃然纸上。我们在欣赏作者直率的同时，看到了他们追求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态度。我们认为，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利于提高田野考古工作水平，也是提高田野考古理论和方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

金无足金，该报告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其一，有的现象，交代得不够清楚。例如，M16 和 M19 的形状，在《浙江余杭反

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中 M16 的形状为曲尺形，在平面图上用实线画出；M19 的形状推测为方形，在平面图上用虚线画出。但在《反山》报告的平面图上，M16 的形状改为实线画出的长方形，而 M19 除了虚线的方形外，又在 M16 东边侧下方以虚线画出一个与其连接的长方形，并在图旁注明“此区域以为 M16 部分，发掘后注明有误，M16 东壁坑线或可能是 M19 的残边。”这或许是《反山》作者将《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中平面呈曲尺形的 M16 改为长方形所做出的解释。如果我们这一理解不误的话，那么就存在一些疑惑。一是《反山》报告中所说的“M16 东壁坑线”当是指《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中 M16 东侧下方曲凸出的那部分实线，若将这部分实线作为“M19 的残边”，而且改画为虚线，似乎很难成立。因为这条线位于以虚线绘出的 M19 下方的中部，与 M19 的东、西两侧边线都难以作垂直的连接；二是《反山》报告中以虚线绘出的曲凸部分，比《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中用实线画出的 M16 的曲凸部分大了许多，如此重大的变动却未做任何说明。

其二，有的器物的出土位置，未能做必要的介绍。各墓随葬器物的平面图上，难以表述的一些器物，其位置与编号，应当做出分图进行说明。《反山》报告中未做此项工作，仅在“出土遗物野外登记表”上作了一些说明，但说明的内容也不全，往往未能注明这部分器物的出土位置。如，据报告 M14 出土遗物野外登记表记述，该墓随葬器物平面图上未标注的器物编号多达60 余个，而这些编号所涉及的器物有 200 多件，其出土的位置均没有说明，仅有“图上未标”的字样。这对于了解该墓随葬器物的总体分布状况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其三，发掘中对陶器的关注，似乎远不如对玉器那样的关注程度。报告中关于陶器的描述，也过于简洁，往往一带而过。这样处理对于时空变异的敏感度通常胜于玉器的陶器来说，似乎有失公允。

其四，有些问题还需要商榷。如，报告的“概述”部分指出，“所谓‘熟土’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考古学术语”，那么“严格的考古学术语”的“熟土”是什么样的土？同报告中所指的“熟土”又存在什么区别？又如，作者说“较硬的灰黄土”，“包含物有汉代绳纹残砖瓦、釉陶片、弦纹陶片和良渚文化陶片、残石器等”，“该层厚 130 ~ 140 厘米”，而发掘“当时对其年代的认识较模糊，用了‘封土层’这样含糊的概念，直到 2002 年下半年编写反山报告时，检视该层出土遗物，同时又对反山做了局部探沟清理，校检地层后，才确证所谓‘封土层’是反山西部良渚文化晚期的另一座人工营建高台”。那么，对于该层所包含的“汉代绳纹残砖瓦”等晚于良渚文化的遗物如何处置？对于该层所包含的“良渚文化陶片”的年代如何认识？是早于 M21 出土的陶器？还是与 M21 同时？或者晚于 M21 的随葬陶器？在未能解释这些问题的情况下，直接做出“‘封土层’是反山西部良渚文化晚期的另一座人工营建高台”的结论，似乎存在一定的瑕疵。

瑕不掩瑜，综合得失，统而观之，我们认为《反山》详细表述了良渚文化反山墓地丰富而重要的内涵，当是近年来考古报告的佳作。这本报告的出版，将为深化良渚文明

的研究，做出重大的贡献。透过《反山》的出版，我们不仅看到了发掘者、编写者的辛勤劳动，还看到了编辑、印制者的认真工作，更看到了现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同志的领导才干。正是在曹锦炎同志担任所长之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志才得以齐心合作，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历年积压的所有考古报告共达 16 种，清还了新旧“欠债”，这在中国考古界目前尚无第二家。

# 一部优秀的考古报告

## ——《反山》

严文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浙江余杭县的反山遗址是1986 年发掘的，正值良渚文化发现50 周年的日子。为此在杭州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学术讨论会，并且在会前组织大家参观了反山遗址。所有参观者莫不为那些极其重要的发现所震撼，纷纷发表感想，觉得过去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实在太不够了。会上的许多发言几乎都认为要提高对良渚文化的认识，要与文明起源的问题挂起钩来。有的人说良渚文化走近了文明的门槛，有的人说已经跨进了文明的门槛。我在会上也做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新阶段》的发言，认为反山的发掘使良渚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今后有关的考古工作也应该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从那以后，人们对良渚附近的考古工作更加关注，瑶山、莫角山、汇观山遗址等重要发现一个接着一个，而整个良渚遗址群的调查也逐步开展起来。这些工作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可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只能看到简报、图录或讨论文章中提供的不完整资料，人们以不无急切的心情期待正式发掘报告早日面世。值得庆幸的是，最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推出了良渚遗址群的一系列田野考古报告，包括《良渚遗址群》调查勘探报告和《瑶山》、《反山》、《庙前》等发掘报告，其力度之大前所未见。由于这些报告的出版，使公众对良渚文化核心区的基本情况和文化发展水平，以及在那里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于推进良渚文化和文明起源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无疑将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几本报告的内容不同，编写各有特色，但就其内容之精彩、编写者投入的精力和达到的水平来说，当首推《反山》一书。

反山发掘之前，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武进寺墩和上海福泉山等地相继发现了良渚文化随葬玉器的大墓，特别是在福泉山发掘中认识到这些大墓所在的土墩或小山乃是人工营建的坟山，并且被苏秉琦先生比喻为“土筑金字塔”。在这些事例的启发下，考古人员自然会想到在良渚也有可能找到类似的坟山。恰巧余杭县一制动材料厂在反山筹建厂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员考察，看到了人工形成的熟土堆积，只是没有发现可以明确确定时代和文化性质的陶片。在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的情况下，主事者认定那是一处良渚文化高规格的墓地，当即与有关方面交涉停建厂房，而着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考古发掘。这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科学预见的战略性决策。

人们常说做考古工作要有课题意识，反山的发掘就是有明确的课题意识和学术目标的考古工作。而且在工程建设有可能危及重要的考古遗迹时迅速采取断然措施。这两点在反山的考古发掘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现在知道，反山至少是经过两次人工营建的土台。第一次营建的时间大约在良渚文化中期偏早，筑成的土台高约 5 米。上面似有祭坛，然后在祭坛上埋了 9 座贵族墓葬。过了好几百年，到良渚文化的晚期，人们在原有土台上加高加大，并且又埋了若干墓葬。此后又过了两千多年，到了东汉时期，再次把土台当作墓地，埋了 11 座砖室墓，把良渚文化晚期的墓葬破坏殆尽，只剩下了 2 座。在这三批墓葬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批 9 座墓葬。从各墓的分布和相互关系来看，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墓地。它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中等级最高、保存最为完整的贵族墓地。

在这个墓地中，M12 随葬品数量最多，品位最高。单玉器就有 647 件之多，还有数百粒找不到归属的玉粒和玉片没有统计在内。被称为琮王的大玉琮、大玉钺、玉柱形器和可能是权杖部件的玉瑁、镦上都刻有完整形态的神人兽面纹，还有镶嵌各色玉件的彩绘漆盘和漆杯等，每件都堪称稀世珍品。而这座墓恰巧处在中心位置，说明墓主人是一位掌握军政大权和宗教法权的首领。这座墓的北端即脚端是 M22，也有很多高品位的随葬品。其中有玉璜和玉圆牌而没有玉钺、玉琮，且是唯一在玉璜上刻有完整神人兽面纹的墓葬，发掘报告推测这座墓的主人应属女性，很可能是 M12 墓主人的配偶。M22 的左边是 M20，随葬品的数量仅次于 M12，其中有玉琮 4 件，石钺 26 件，说明墓主人生前拥有很大的神权和军权。M12 的右边有 M17 和 M14，左边有 M16，这几座墓的随葬品也很多，并且都有玉钺，又紧靠 M12，显示其地位显赫。M23 在 M14 的北端即脚端，随葬品中有玉璜、玉纺织具、玉圆牌和玉琮而没有玉钺，墓主人可能是 M14 墓主人的配偶。M15 和 M18 位于墓地西侧稍远处，各随葬有数十件玉器，数量和品位均低于以上各墓，其中也有玉琮和刻有神人兽面纹的“冠状器”等，地位也不算太低，报告推测其墓主人可能属于以 M12 为中心的上层贵族中的“臣僚”或“巫觋”。由此可见这 9 座墓的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个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其地位不但在良渚遗址群中是最高的，就是在整个良渚文化中也是无可攀比的。

从各种角度分析，良渚遗址群的中心遗迹应该是莫角山那巨大的长方形土台，它上面的大片夯土应该是宫殿一类礼制性建筑的遗存。而反山就在莫角山的西北角，二者相距不足 100 米。在那里营建最高统治者的坟山，一定是经过慎重选址和精心设计的。不过以 M12 为中心的墓地持续的时间并不很长。根据前面的分析，可能还不到两代人，莫角山的中心地位似乎不会这么短。如果这个估计不至于大错，就近还应该有或早或晚的同样规格的墓地。在反山之后发掘的瑶山和汇观山尽管也是高级贵族的墓地，其地位似乎还无法同反山相比。因此我推想反山尚未发掘的东半部，是否存在另一个或两个规格相当、只是年代上略有先后的最高贵族的墓地呢？

反山发掘已经过去 20 年了。在这 20 年中，有关良渚文化的重要发现可以说是一个

接着一个，其中没有一个可以同反山相颉颃的。随着时日的推移，反山和莫角山的中心地位也日益显现出来，这对于估量良渚文化的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反山出土遗物中以玉器为最多，也最受学界关注。如果说草鞋山等地的发掘第一次辨识出良渚文化的玉器，并且把过去流散在海内外的一大批所谓周汉玉器而实属良渚文化的玉器得以识别出来的话，那么反山的发掘则极大地提高了良渚文化玉器的研究水平，进而把中国史前玉器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原因概在于良渚文化的玉器规格最高，品种繁多，绝大部分并非单体成器，而是由多个部件联系在一起的组装件、穿缀件和镶嵌件。如果在发掘时稍不留意，这些物件的整体形态和功能就无法辨识，成为一堆形状大小各异而乱无章法的零碎物件。例如玉钺在过去多只发现钺体本身，连如何安柄都不大清楚，甚至有错认为是玉铲的。这次发现的几件玉钺虽然除本体外柄部腐烂无存，但是还有柄两端的玉瑁和玉镦，二者相距约 70 厘米，可知钺柄大约有 70 厘米长。不但如此，在钺柄的部位散布有许多玉粒，有些玉粒上还粘有朱漆痕，显然是镶嵌在漆木柄上的饰物。有的柄端还有琮形管，很可能是璎珞上的挂件。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不但使已经散开的各个部件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而且可以清楚地了解玉钺的整体形状和豪华气概。有的器物如琮、璧等尽管是单体的，也可以从随葬的具体情况得到新的认识。按照传统的看法琮、璧二者应有配伍关系，但反山的情况证明二者在数量上不成比例，制作的精粗上明显有别，在摆放的位置上也看不出有特别的联系，可以肯定良渚文化的琮、璧是没有特别的配伍关系的。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这可以说是对史前玉器研究的一大贡献。

反山发掘的可贵之处在于事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发掘每一座墓葬时都非常注意所有随葬物品的位置和相互关系，直到弄清楚以后才记录和起取。有的在田野中实在分辨不清，在室内还要细心研究。这本来是任何考古发掘的基本要求，可惜不是每一个发掘都能够做到的。这不完全是考古水平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责任心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的问题。

反山的漆器也十分引人注目，其中最大的当然是葬具，也就是漆棺。至少 5 座最大的墓都有漆棺，可惜全部腐朽只剩了漆皮，无法窥知其本来的面目。而最华贵的当数 M12 的漆杯和漆盘。二者除造型和花纹讲究外，单是镶嵌的玉粒和玉片等就分别有 141 和 182 件之多，品位之高可想而知。由于胎骨完全腐烂，只剩漆皮和镶嵌的玉件，经过细心的剔剥、翻模、起取和室内研究才得以大致复原，使我们能够欣赏到几千年以前的工艺精品。略显不足的是漆杯插图正反面大小不一致，不知哪个是正确的。从插图、翻模的照片和文字描述都说明这件漆杯有把有流，流部上翘，很像那种有针刻纹饰的宽把带流陶杯。可是复原的漆杯却是平口，无把无流，这是不应该有的差错。

总体来说，这部报告有两个特点是比较突出的：

首先，报告全面如实地报道了反山考古调查与发掘的资料，并且经过充分消化，较好地处理了重点与一般的关系。考古报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面如实地报道所得资料，

但事实上许多报告做不到这一点，这是令人遗憾的。全面报道资料不等于开流水账，照单验收。一定要有研究，看什么是最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或最为突出的，就要把它的代表性、重要性或突出特点表现出来。一般的情况也不能省却，既要面面俱到，又力求有所概括，有所分析，尽量节省篇幅。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进行全面的考察，注意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以获得最佳的解读。反山遗址的重点是良渚文化中期偏早的贵族墓地，墓地中的重点是处于中心地位的 M12。报告如实地报道了该墓的发掘情况和保存状况，强调了改进发掘方法的重要性。接着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了随葬器物中号称琮王的大玉琮、大玉钺、玉柱形器和可能是权杖的瑁与镦，因为这些器物上都有神人兽面纹，有的还有繁复的地纹或其他纹饰，刻纹的纤细程度有如微雕，报告以多幅放大尺寸的插图（整体的、分幅的和细部的）、拓片和彩版等多种方式相配合来表现，并且配以详细的文字说明，使读者对良渚工匠精湛的雕刻技法和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等有了真切的认识和感受。这还只是该墓随葬器物的一小部分，如果把全部随葬品联系起来，再同周围的其他墓葬相比，那位墓主人高踞于群雄之上的王者形象和气概便表现得淋漓尽致，埋葬在他周围的显贵自然就是以他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这恰恰是反山发掘所获得的最重要的信息。《反山》报告突出地强调了这一信息，体现了编写者的深刻用心和学术水平。

其次，报告特别注意总结田野工作经验。一份发掘报告不能只写发现了什么，还必须写如何发现的以及发掘的理由。这里有对遗址基本情况的了解，有对它的性质和学术重要性的判断，还要有预期的学术目标和为达此目标而制定的工作计划。另外还可包括如果发掘过程中遇到了事先没有估计到的新情况，是不是做了相应的调整和对策、实行的效果如何等内容。写出这些内容乃是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发掘报告所提供的考古资料，以便于做更深入的研究；同时也是为了总结经验，便于相互交流以提高田野考古水平。为此我曾经多次呼吁，可惜大部分发掘报告忽视了这方面的内容。反山报告则非常重视，讲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也讲了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毫不隐讳。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6 年 7 月 12 日第四版）